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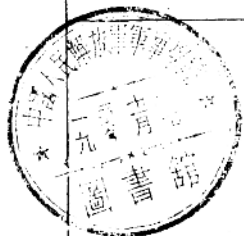
BY

LEWIS H. HANEY

TRANSLATED BY

CHUANG CH'I FANG, M. 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美國韓訥著  
臧啓芳碩士譯

經濟思想史  
名著經濟

商務印書館發行

#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Y

LEWIS H. HANEY

Translated by

CHUANG CHI FANG, M. A.

1st ed., Jan., 1925

3d ed., July, 1927

Price: \$4.00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初版

回(經濟名著)經濟思想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美國 韓 訥

譯述者 臧 啓 芳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濟南 太原 西安 蘭州 重慶 成都 廣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譯者序

譯者聞吳禪暉先生言國人如欲言文化當先譯書三萬卷，乍聞之頗有疑問：何以不先譯書即不能言文化？然試一詳察我國文化現狀，當知此言之不謬。除中等學校教科書稍稱齊備外，——亦非真齊備，——關於大學與專門高深科目之著本或譯本實寥寥可數。因而大學與專門高深科目之教授幾於全用西文原書。其結果因語言之隔閡，欲學生一一澈底領悟，勢恐難能；教授對於解釋原書之意義必須格外用力，講授之效率亦遂較用中文著本爲遲。反觀歐美，無論教室討論或學者著書未聞有不用本國語言文字者。美國學生能閱德文書或法文書者多，爲入畢業院之學生，在大學未畢業之前能暢曉一種外國文字者甚少。然其實際學識未必不高於我國能兼讀英文書之學生。一言以蔽之，間接由外國語言文字以求智識必費時多而成功少，我國大學與專門若不全用國文講義，不全用國語教授，我國學術必難進步。然今日我國專門著作有幾？專門教授人才是否充足？書不足，人又不足，將奈之何？此無他，亦惟力求其充足而已。充足之方雖多，譯書其切要者也。譯書既多，國人得其參考學術自可進步。至是始知吳禪

暉先生所謂不先譯書不能言文化之說之有由來。

嘗聞日本留學歐美之學生多不長於語言而長於譯述，往往歐美一有新書，日本即有譯本。學術進步，此其原因之一。吾國留學政策行之已數十年，文化上所得供獻殊少。祇就社會科學而言，最佳者不過往年嚴幾道所譯原富羣學、肄言、天演論等書，近年馬凌甫所譯國民經濟學原論、吳柳隅所譯國民與國會、馬君武所譯一元哲學諸書。（此外有佳者為譯者所未知。然今日國內譯本亦絕非其多。）未免太少。譯書既形太少，文化何由進步？譯者深願吾國學者亦極力從事於譯書事業。否則，再過一世我國文化亦未必能優於今日。

譯者譯經濟思想史既畢，聯想甚多。一，思想不能不為環境所影響，環境不能不為思想所轉移。（原書作者已甚備重此理，尤以在首章與末章論之為詳。然譯者所言別有所重。）此種公例殆莫可逃。亦惟不逃於此種公例，人類

生活始可增高。國家文明始可進步。所以然者，處寒當言寒，處暑當言暑。人之思想雖為主觀，若不依據環境情況以施其主觀判斷，則將為誰謀？英國大地主跋扈，學者即注重地租問題，美國工業幼稚，學者即注重保護政策。因英學者肯研究地租問題，大地主之跋扈漸少；因美學者肯提倡保護政策，工業之發達甚速。否則英人若舍其地租問題而

不問，佃民何以爲生？美人若舍其關稅政策而不講，產業何由振興？由此觀之，思想不獨爲環境所影響，且當以環境爲研究之範圍；環境不獨爲思想所轉移，且必藉思想之推闡而爲用始宏。環境又有主觀與客觀之別。主觀環境爲當時本國與外國之思想，客觀環境爲當時本國之自然情況與外國自然情況之關係。總之，學者言學，一應知其所處之國家爲如何之國家，二應知其所處之時代爲如何之時代，三應知其所處之國家與時代有如何之思想與如何之自然情況。

二、事實之進步由漸而入，思想之進步亦由漸而入；無論爲事實或爲思想皆不可躐等而進，亦不能躐等而進。證以歷史經驗則此理立見。昔在雅典，柏拉圖曾倡共產主義，然不惟當時之社會情況不適於此主義，卽當時學者亦多反對此主義。亞里士多德正爲其例。且由茲以迄今日，因社會推演終未達於可以實施此主義之時期，遂未有能反於漸進之理而強行此主義者。今之俄國可謂爲初達於試驗時期，然功效未見而人民之痛苦愈深，實行此主義之時期果已達到否，殊是疑問。柏拉圖自稱其所期許之國爲「理想國」，可謂名符其實。迨至十九世紀初葉，普魯東曾倡無政府主義，然因法國革命

而後民治方有進步，小農小工小商又頗形發達，貧富不甚懸殊，其說卒難實現。雖以馬克思與英哲爾士之宏才毅力，倡世界社會主義於十九世紀中葉，終不能使德意志棄其狹義國家主義，以免除二十世紀開幕之大戰爭。社會主義在德之影響多屬於國家社會主義，屬於世界社會主義者殊少。自理論上觀之，世界社會主義自優於國家社會主義，然時機未至，躡等不可，理論自亦不能獨步當前。反之，重商主義承中古消極之弊，力倡保護政策，大生效力，竟使各國實施其理論逾兩世紀之久。重農學派與斯密亞丹又承重商主義之弊，力倡放任與個人主義，亦大生效力，影響幾遍全歐。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未嘗不優於重商主義與個人主義；然一則時機未至，不可以強行，一則應時而出，遂得以風行於世。純就理論而言，前三主義之發生亦極有功於學術，惟其影響屬於反動。反動之於進化常事倍而功半。以社會之進化考之，必有達於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或世界社會主義之時。然進化以漸，不可以一蹴而就。學者論學，不可徒眩於高超理論，舍應研究之階段而不研究；政治家言政，亦不可專驚於理想制度，舍應趨行之步驟而不趨行。否則將必欲速而反遲。

三、不察於已往，不知現代制度之由來，不明於現代制度，不知弊害之所在；欲察已往專賴於歷史，欲明現在專賴於統計。使有人問何以我國今日之經濟生活竟如是其低劣？此種經濟制度由何演化而來？若不察於我國經濟史之經過，將何以答之？使又有人問我國之生活程度究竟如何？我國之經濟制度究竟良惡？若不依據統計紀錄，將何以答之？然我國今日無經濟史，我國今日無統計記錄。此不獨使實行改革者無從著手，亦且使有意研究者無所依據。如極端歷史學派之純以歷史法爲研究經濟學之方法固爲不可，然若我國之毫無歷史搜集亦豈能行至於統計之重要著者曾特言之，譯者對於統計於我國學術之希望尤甚於著者對於統計於經濟學進步之希望。

四、西方學者重批評不事攻訐。思想進步端賴批評。一人之思想有限，多數人之思想無窮；一人之觀察狹陋，多數人之觀察廣大；果能互相參證，互相辯難，真理必隨之而出現。西方雖呼斯密亞丹爲政治經濟學始祖，後世批評其說者竟層出不窮。不惟反對派批評之，卽祖述者亦批評之。賴於批評之力，經濟學之哲學，方法，與理論遂有今日之進步；今後之進步更爲何如，則又爲今世批評家之責任。然批評非攻訐。批評是以己之所



見評人之是非，是者和之，非者駁之。社會主義者雖採取古典主義之勞力原費說而駁斥其分配理論，然不因駁斥其分配理論並勞力原費說而亦棄之。奧大利學派雖採取古典主義之哲學與方法而駁斥其物值理論，然不因駁斥其物值理論並其哲學與方法而亦棄之。且和之有和之之說，駁之有駁之之說，無論和之駁之，僅限於發揮己意以待正於人。攻訐則不然。好攻訐者專以排除異己爲事，但患人之說伸，己之說屈，而不問理之何在。西方學者亦未嘗無犯此弊者，如非議馬爾薩斯人口論之學者，非議李嘉圖地租論之學者，與新系歷史學派之趨於極端，皆顯有攻訐之意。蓋凡事一走極端則真理卽不可見，故貴在「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五、範圍不清，條理不整，系統不明，不可以稱爲科學。既曰科學，則選擇材料須有範圍，排列方法須有條理，推論關係須有系統。中古以前經濟觀念與道德觀念及法律觀念無別，經濟學之範圍最爲混淆，學者著述復無條理，無系統，經濟學遂不能成爲獨立科學。迨斯密亞丹承重農主義而起，劃分範圍，整飭條理，創立系統，經濟學遂得以進爲獨立科學。文明愈進步，科學分類愈複雜。晚近社會學已成爲獨立科學，實用經濟學中如

財政學，保險學，運輸學，與銀行貨幣學等亦皆離於純正經濟學而獨立。以已往推未來，尙不知分科之複雜將達於如何境地。然使範圍不清，條理不整，系統不明，終不能成其爲科學。

六，真理寓於相對之中。所謂相對適與絕對立於相反之地位。蓋任何主義不能盡善，亦不能盡惡。吾人不惟深知一種主義不能完全適宜於各時各地，卽在一時一地吾人亦不能完全依賴一種主義。若因承個人主義之弊而欲實施社會主義，遂完全限制個人活動，毫不容社會中猶存有競爭之意，勢必至以人類爲社會機件，任其智愚高下皆須屈服於機械行動之中，社會進步豈有不被抑阻之理？反之，若因個人活動可以發展其本能，遂完全信賴個人主義，凡事純取放任，亦必至競爭無度，互相傾軋，其結果強者特占優勢，弱者盡被蹂躪。故所謂真理，祇是相對之真，比較之真。值此時，處此地，此主義可用，亦祇限於測重其所長，而當兼取於其他主義以補救其所短。

七，歷史常顯有進步之循環。此類例證不一而足。以商業與國家之關係言，上古與中古完全輕視商業，學者至鄙之而不屑研究；中古而後，重商主義大占勢力，學者至舍此

而別無所談。迨斯密亞丹出，倡自由貿易，以商與農工並重，商業復失其優勢，稍後德美保護派興起，力與斯密爲難，竟演成今日重商主義再現之世界。然斯密之抑商，不過不認商較農工爲重，非從上古與中古輕商之意；今世之重商主義，固不以農工爲後盾，亦非復十六與十七兩世紀之重商主義。蓋事雖屬於循環，理則已有進步。由此推之，今世重商主義之未來反應，必爲一調和自由與保護二說之折衷理論，將遠勝於斯密亞丹之自由貿易說。（斯密之說原有限制，然終過於偏重自由貿易。）他如本書中論學者採用方法之循環，（本書第七節，最末一段。）亦爲進步循環之例，可資參證。

八、人類生活必難逃於互助之理。此不獨個人與個人之間有賴於互助，即個人與社會之間亦有賴於互助。社會賴個人之努力而進化，個人賴社會之維持而生活。此不獨個人與社會之間有賴於互助，即社會與社會之間亦有賴於互助。自一國之實業論之，工業不興則商業不振，商業如振則工業可興；交通不便利則產業不發達，產業如發達則交通將便利。自國際之關係論之，純取保護不可以通行於今日，不採互惠將坐失國際貿易之利益。自科學與科學之關係論之，一科學有進步他科學亦隨之進步——如

心理學之於經濟學，一科學不進步他科學亦難有進步——如統計學之於經濟學，總之人既不能離羣而獨居，即起居飲食亦皆受互助之賜，故互助一理實難逃於天地之間。

最後，取我國經濟思想與西方經濟思想略相比較而勉求一補偏救弊之策，亦必饒有興味。以譯者觀之，我國經濟思想短於純粹經濟觀念而長於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觀念，西方經濟思想長於純粹經濟觀念而短於人生哲學觀念。他事且勿論，即以我國數千年文明言之，竟迄今無經濟學專書，經濟思想僅散見於經史與諸子百家著作之中，已可以為短於純粹經濟觀念之左證。然短於純粹經濟觀念並非未有經濟觀念。例如尚書「洪範」嘗以富為五福之一，以貧為六極之一；與司馬遷著史記嘗別立貨殖傳與平準書，我國經濟思想亦未嘗不可略資考證。雖然，我國經濟思想多為人生哲學所抑制，故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蓋由來言政治者罔不以「儉

「約」爲要義，言國用者罔不以「量入爲出」爲主旨。司馬遷之著貨殖傳不過爲卑視「賤入貴出」之行爲，著平準書不過爲貶斥漢時言計之臣而已。其在西方，自斯密亞丹以降，多純言經濟主義，幾不容人生哲學觀念參雜於經濟思想之中。故所謂「自利」所謂「快樂與痛苦之比較」，所謂「以最小犧牲得最大效用」皆成爲談經濟學者莫能更易之原理。

與前項區別緊相關聯者又有重社會觀與重個人觀之不同。我國前哲除楊子外幾未有不重社會觀者。墨子兼愛至於摩頂放踵而不惜；孔子言仁以克己爲先；孟子言義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爲旨歸；凡此皆所以限制個人活動，犧牲個人利益，以希圖社會之安寧與進步。至於西方，由重農學派以迄今日，雖對於「放任」，「競爭」與「個人主義」間有反動思想，而「放任」，「競爭」與「個人主義」終爲其經濟進步之要因。蓋我國既重人生哲學即不能不重社會觀，西方既重純粹經濟觀即不能不重個人觀。

因是我國經濟思想遂散漫而混淆，西方經濟思想遂整齊而分明。散漫與混淆之結

果思想毫無進步，整齊與分明之結果，思想大有進步。

雖然，西方思想之缺陷亦正非少。百餘年來西方人士所受於「自利」、「競爭」、「個人主義」與純粹經濟觀念之賜，祇爲產業發達與科學進步之兩端，至於與產業發達及科學進步相伴而來之罪惡，實不勝枚舉。犖犖大者，則有階級傾軋，貧富懸殊，與殘害生命數端。後世批評家雖有反對李嘉圖所言社會各階級利害衝突之說者，而社會各階級之利害衝突終未幸免。數十年來資本與勞動之戰爭日加一日，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於其前。去歲英國之鐵路與煤礦罷工，幾使睥睨一世之政治家佐治洛意一籌莫展。現今美國之煤礦罷工亦漸有不可收拾之勢。據美國新聞所載，一九一九年之煤礦罷工損失生產額四千萬元，損失工資六千萬元。由一八八一年至一九〇五年，祇美國一國竟有三萬六千以上之罷工次數，受損失之工人逾於八百七十萬。倘合歐美由來之罷工而統言之，其受害之深殆不可計。次之則有貧富之懸殊。據美國伊黎教授所考，美國馬塞秋色州、英國、法國與普魯士等處，無恆產之人皆逾於其他全人口五分之一；在馬塞秋色州擁有全州財產總額之半者，僅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在普魯士占百分之一。

又十分之七，在英國則僅占千分之四，在法國僅占千分之八。（見氏之財產與契約）貧富懸殊既如

是其甚，大多數人之幸福得不爲之犧牲乎？再次之，更有殘害生命一端。祇就美國而言，

在一九一七年因工廠失虞而喪命者，至有七萬五千人之多。據費霞教授所考，專計算

由於工廠失虞而發生之工資損失與醫藥及埋葬等費，年需九萬六千萬元。（見氏之國民生命之報告）

生命之損失既如是其多，金錢之耗費又如是其巨，得不令人厭惡今日之工業制度乎？

總之，時至今日，西方經濟思想之弱點，殆已盡形披露而無餘。彼雖遑遑不暇，終日講求

失虞保險，老年贍養，失業救濟，與兒童保育，皆屬舍本逐末，得不償失之舉動。倘或猶不

覺悟，則來日艱難正未可量。（實則歐美學者今日已有引此以爲憂者。）

惟譯者殊不暇哀人而當自哀之。前所述之比較，在我國則爲上古之思想，在西方則

爲近世之思想。我國上古之思想，猶可以與他人相比擬，迨至近世，直無思想之可言，可

憐孰甚？蓋自秦漢以降，學術日衰，思想不振，雖唐、晉、宋、元、明、清各代，忽而論文章，忽而講

清流，忽而談性理，忽而尙考據，盡屬雕蟲小技，無補大計，致使文化進步因而停滯。不過

在此各代之中，猶稍重人生哲學與社會觀念，尙未盡墜我所固有之美德。降及清末，以

迄今日，因懲於西方之勢力，悚於西方之富強，則幾欲盡數拋棄我所固有之美德，而完全講「自利」、「競爭」與「個人主義」。乃我所講求之自利、競爭、與個人主義，又與西方所講求者不同。在西方常藉「自利」與「個人主義」之原理發展社會富力，藉「競爭」原理闡明科學主義，故猶可收功於產業發達與科學進步之兩事；在我國，以言競爭則欲侵佔他人，以言自利與個人主義則置社會之幸福於不顧。一言以蔽之，我國之美德殆已盡喪，他人之優點又未取得，今所摭拾者多為他人之所短。於是，補偏救弊，當竭力恢復我所固有之美德而推闡之，盡量吸取他人之優點而利用之。惟欲求經濟思想之調劑與經濟學之進步，譯者有不得不再具體申言之者：（一）當竭力保存我所固有之人生哲學思想與社會觀念；（二）但不當使其復與純粹經濟觀念相混淆，或抑制純粹經濟觀念之發達，以防害科學進步；（三）當合羣策羣力以從事於統計調查，庶可使研究者有所依據；（四）當一方鼓舞經濟之研究，一方力謀增進一般人之經濟生活。

譯者至是願對於讀斯編者稍進一言。原書既為供美國大學高級學生之用，所講者又為思想史，讀者自以先具幾種基本觀念為順利。最要者為經濟學與經濟史，次要者



爲哲學與論理學。（著者以哲學與方法爲批評依據，故此兩科之關係頗爲重要。）他如社會學，心理學，人生哲學，政治學，法學與歷史等亦皆有相當關係。

斯編之成譯者有當特別感謝者二人，一爲吳柳隅先生，二爲李君光忠。吳先生曾爲譯者審定譯稿全文，糾正極多，故當特別感謝。李君與譯者同學於美國加州，對於斯編協助最多。不惟譯稿曾爲李君逐字逐句校閱一遍，舉凡名詞之審定，體裁之規畫，疑難之討論，誤謬之改正，字句之斟酌，皆深賴於李君。而翻譯法文書名與人名又全賴李君之協助。使無李君，斯編之缺陷必多於現在數倍，故必特別感謝。又周君天放與韓君隆毅對於第一章皆曾校閱一遍，對於前半部之名辭商榷多有助力；宋君介對於後半部字句之斟酌與名辭之討論殊多裨補，皆甚爲譯者所感謝。

雖然，一切誤謬皆由譯者個人負責，如再版將力改之。

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臧啓芳序於美之亞麗藏娜州立大學